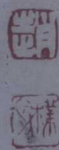


● 北京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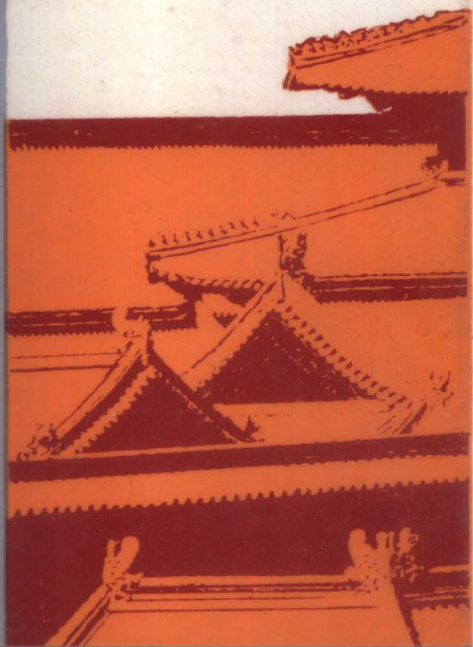
中日比較文化論集

趙樸初題



ZHONGRIBIJIAO
WENHUALUNJI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日比較文化論集

北京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編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日比较文化论集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张岩峰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插页 237 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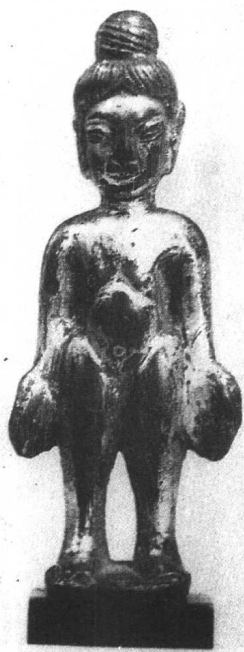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100册 定价：4.9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070-3/G·977



↑ 图 1



← 图 2 图 3

1. 摩耶夫人群像 七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2. 宣言形诞生佛 八世纪 日本东大寺
3. 灌水形诞生佛 中国北魏 东京某氏私藏

图 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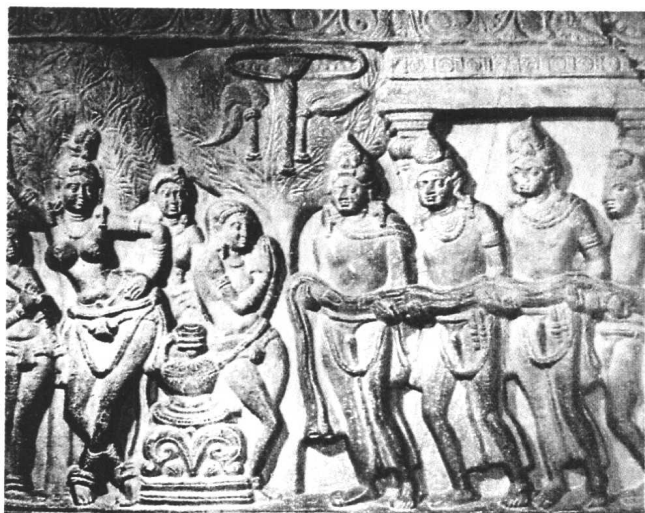


图 5 图 6



4. 「佛不表现」期印度作品 摩耶夫人树下生子场面
 5. 大报恩寺像 十三世纪
 6. 悟真寺像 七世纪现藏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

图 7 →



图 8
↓

图 9 ↓



7. 龙门古阳洞龕楣浮雕（局部）
北魏孝明帝(516—528)期作品
8. 北周作品
9. 正眼寺像 七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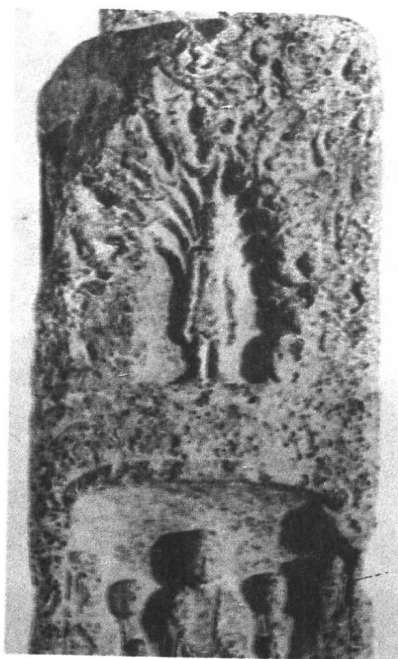




图 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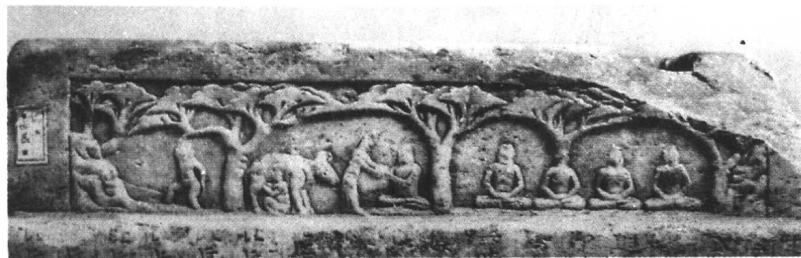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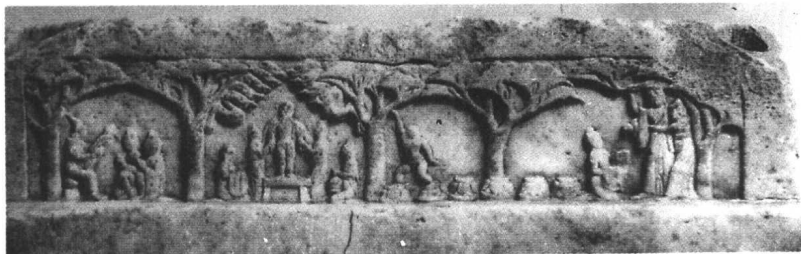
图 10 ↑

10. 印度作品 从左至右为托梦
宣言（灌水）、树下出生

11. 南北朝灌水形诞生佛 现藏
美国某地

12. 北齐天保十年（559）作品

图 12 ↓



60/415/22

序

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象中国和日本这样文化关系异常密切的国家，实不多见。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过去的论者多强调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面，而不甚注意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一面。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偏颇。

去年在中国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的会议上，我发言时引用了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谈了中日的文化关系。这三个阶段是大家所熟知的：正 (These)、反 (Antithese)、合 (Synthese)。我觉得，这个理论完全可以应用到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来。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直至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这算是正的阶段。从1868年起直到1949年或者前后，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这算是反的阶段。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长远的未来，是中日共同学习、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时期。这算是合的阶段。当时我曾强调说，中日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源，我们都清楚了，是一个非常长的源。流，我们还不清楚，可能是一个比源还要长的流，现在还难以估算。我们现在常常讲，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代友好下去。这个口号非常响亮，中日两国人民都同声响应。但是，具体内容则颇有点模糊。现在我提出了三个阶段的说法，又把重点放在第三个阶段上。我想，我的看法是能够令两国学者所接受的。在那次会议上，

我发言后，就有日本学者表示同意，并同我握手长谈。我的看法至少可以弥补那个模糊的缺憾。

我在上面两次用了“主要”二字，意思是说，即使在两国之一向对方学习时，也不会是纯粹的一边倒，也还有互相学习的成分在。

我在那次会议上着重解释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确地提出来过。我碰到不少日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学者，他们也都只是强调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面。那么，我为什么现在提出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问题呢？试想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情况，便可一清二楚。当时的人们昭告天下：向西方学习。但是许多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却同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当然同时也就学习了日本。我举出几个代表人物的名字：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苏曼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等，都是非常显赫的名字。汉语中很多科学名词和政治术语，都是从日本移栽过来的。连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最早的汉译本，恐怕主要根据日译本转译的。20年代，许多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也是从日译本译过来的。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可惜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我必须在这里着重提一下。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虽然中日两方面的学者都努力研究对方文化的特点，但是比较研究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我对于中日文化交流问题是一个门外汉，了解得不多。可是就我浏览所及，中日文化对比的研究确实还有待于发展和提高。我早就希望，有朝一日，中日双方的学者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果然注意到了。1987年10月，中日两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主持下，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下，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中日比较文化研讨会。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内容精湛的论文。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论文，推动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们，汇集了这一本《中日比较文化论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一定会受到中日两方学者们的热烈赞扬。

中日两国人民间已经有了长达两千年的友谊。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两国人民又都渴望加强、发展这个传统友谊。加强、发展友谊的方式多种多样，而通过加深彼此的理解则是最有效的。想加深彼此的理解，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而通过彼此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是最有效的，最根本的。现在，中日文化的对比研究方在开始，来日方长，前途辉煌。我在上面曾引用过黑格尔事物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合的阶段。在互相学习、共同前进的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将真地世代永远友好下去。

是为序。

季羨林

1989年3月21日

目 次

(以姓氏笔画为序)

日本：摄取文化的走廊

——中国近代史上对日本文学

的接受与选择……………(日) 山田敬三 (1)

六朝诗与《万叶集》……………(日) 中西 进 (13)

圣德太子与魏晋玄学……………王 勇 (26)

试论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王晓秋 (41)

日中文化比较

——涅槃图·佛教故事·

心学及革命……………(日) 加藤周一 (53)

中世末期的禅宗文化与汉语词汇的普及……………孙宗光 (64)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集体生活……………孙宗明 (72)

家庭本位与群体本位

——论中日文化中“和谐和

合群精神”的差异……………刘金才 (88)

中日技艺观的比较……………刘振瀛 (109)

杨守敬的来日以及与日本书法家

的交流……………(日) 杉村邦彦 (141)

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严绍璁 (154)

从俳句《古池》的理解谈起·····	李国栋 (173)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	周一良 (180)
大和民族心理素质的历史考察·····	官文娜 (186)
中日佛教的比较·····	杨曾文 (204)
平清盛逆臣说	
——日本中世纪忠臣观念的剖析·····	杨晓捷 (216)
天孙降临神话的比较研究·····	药会 (228)
人工对称与自然和谐	
——中日民族审美意识比较·····	高增杰 (242)
日语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比较	
——兼谈日本人的语言心理·····	董将星 (249)
中国近代史上的“亚洲与欧洲”·····	(日) 滨下武志 (263)
试论诞生佛造像中的宣言形造像·····	漆红 (274)
日本近世小说与中国小说·····	(日) 德田武 (289)
中日阳明学比较·····	魏常海 (298)
编后记·····	(313)

日本：摄取文化的走廊

——中国近代史上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与选择

日本神戸大学教授 山田敬三

序

对于接受外国的文化，19世纪的清王朝远没有同时期的日本政府热情。这一点，与中国的王朝历来以华夏为中心君临世界、以独自的文化体系为自豪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无关系。即使是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洋的冲击”之后，清王朝内部的进步势力也遭到了保守派的阻碍，很难有活动的余地。进步势力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国文化以克服当时面临的危机，而夜郎自大的权威主义者的保守派则惟恐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丧失了他们的既得权益。

从鸦片战争战败算起，直至洋务派提出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在军事上实行改革为止，亦即直至公认一向视为只是“夷狄”的一部分的欧美列强，在技术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并将此具体化形成政策时为止，就花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进一步体验了决定性的“内忧外患”之后，“以夷制夷”的洋务派才开始可能有了出头之日。

但是，众所周知，单单将西方的技术移植到中国、仅靠重视军备更新与振兴经济的富国强兵政策，尽管付出了30多年的努力，但是并未能有效地阻止住英·法·俄·美等列强的不断侵略。不仅如此，曾经作为中国的藩属的小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不顾一切地采取近代化政策，使得中国无法与它较量，这一点在甲午战争(1894—1895)的结果上表现得非常清楚。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于旧的制度本身开始进行改造的“变法自强”派的运动给时代带来了新的空气。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前期的一部分的政治小说的直接成因，即是源于这一变法自强运动，同时，它是在与日本的政治小说的密切关联中逐渐形成的^①。

此后，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都是在后者有选择地摄取前者的基本方向上展开的。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那么，中国近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是如何选择、接受的呢？其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本文拟分为如下的若干项目对上述问题作一鸟瞰的通观：

- (1) 关于政治小说 (2) 演剧运动的兴起
- (3) 文学革命的背景 (4) 文学思潮与论争
- (5) 日本文学的翻译 (6) 摄取走廊的限度

顺便指出，这里所谓的“近代文学”，日本是指明治18(1885)年发表的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以后的文学、中国则指胡适于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后的文学，关于政治小说，笔者认为其本质上是所谓“近代文学前期”的东西，或是属于“启蒙期的文学”^②。

(一) 关于政治小说

日本的政治小说，与自由民权运动相互呼应，作为一种理性

概念的启蒙手段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同一时期，狄更斯、李顿、仲马等欧洲政治小说的翻译也非常盛行，这些小说的输入意图与自由民权运动之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联。政治小说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副产品。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反过来通过政治小说，一批批青年才投身到了运动之中去。甚至可以说，政治小说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正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这一点正是政治小说与其后的近代小说所不同的最大的特色。

政治小说的原则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的，它的根本观念与看重文学的自律功能的所谓近代文学观截然对立。政治小说的作家之中，大多数是当时的著名政治家，明治专制政府彻底的言论统治，形成了在野的政治家转而从事政治小说创作的一大动机。

《经国美谈》的作者矢野龙溪、《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四朗等，情况都是如此。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日本的政治小说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全盛期^③。

在中国，前面所讲过的洋务运动失败之后，19世纪90年代开始了变法自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变法”暂时得到了实施。“洋务”不敢对制度进行改革，而仅仅是幻想将西方的技术用于中国；与此不同，“变法”则主要是以改变制度与法制为己任，同时，后者还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一个重要的模式。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提出的第六次上书（1898）中，清楚地谈到了在变法中的明治维新的地位。

但是，变法的政策在保守派的反扑（戊戌政变）下夭折，运动的中心人物康有为与梁启超只得逃亡国外。故而，中国的政治小说的根据地也就移到了日本。梁启超主宰的维新派杂志《清议报》上连载了《佳人之奇遇》的译文，旨在通过这一小说将他们的政治主张通俗易懂地加以启蒙介绍。但是，尽管译文原则上是逐字逐句的翻译，与维新派的观点有抵触的部分内容有些还是被删

节掉了，或是相反地插入了一些原作中所不曾记述的内容。这是一种着力向读者诉说著者的理念的“翻译”，甚至可以看作是一部改写了的作品④。

梁启超在开始连载《佳人之奇遇》时所写下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成为其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的雏形，是他的最初的政治小说论。其后，《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等一系列作品在杂志《新小说》(1902年创刊)上问世，《新民丛报》以及在日留学生杂志也成为这些小说的舞台。既然变法派的政治理念与明治维新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相互一致，在他们的政治小说中，这一理念也无疑要反映出来。不过，维新派的小说的内容是要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实际相为呼应的，中国的政治小说，它的理念的大纲以及发表形式等脱胎于日本，同时，作为一种推进变法维新运动的手段，在梁启超等人的手中又得到了灵活的应用。

(二) 演剧运动的兴起

在戏剧领域里，从清末开始，在日本“新剧”(即话剧——译者注)的影响下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动态。开其先河的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在川上音二郎以及贞奴等人演出的“壮士剧”的刺激下，于1907年春结成春柳社，得到了新派演员藤泽浅二的指导，在东京公演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及小仲马的《茶花女》，曾孝谷、李叔同以及稍后的欧阳予倩、陆镜若、马绛士等参加了演出⑥。

中国传统戏剧以唱腔和武打为主，有许多约定俗成的程式，而新的“话剧”则重在对话道白。在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它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并以“文明戏”的名称迎来了其全盛期。当时人

们曾说：欧阳予倩受到了河合武雄、木下吉之助的很大影响，马绉士学于喜多村绿郎，陆若镜以藤泽浅二郎为师，而且甘愿在日本的剧场充当配角，由此而积累舞台经验。但是，文明戏的最初的成功却导致了有关人员的懈怠，演出技巧以及剧本的创作都流于浅薄，到了1917年前后，文明戏迅速濒于凋落，受到了话剧提倡者们的严厉的批评。

随之，“文学革命”的口号被提了出来，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4月）一文中提出应当选择出“三百种戏剧”加以翻译，剧作家宋春舫（北京大学教授）随即就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7年10月）上发表了《近世名剧百种目》，其中所罗列的剧目，除了印度的泰戈尔的一篇之外，其他全部是西欧诸国的戏剧作品，同时可以推测出，日本戏剧界的动向对于这一剧目的选定标准也有着潜在的影响。易卜生的所谓“问题剧”的流行，就反映了戏剧界与这一潮流相呼应的动向。

当时，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中心编辑的杂志《新潮》，时常刊载翻译的欧洲戏剧，其中一半左右是《近世名剧百种目》所选定的剧本，其中有一些或许是根据日文的译本翻译成中文的。他们是在采取新的文艺表现手段的同时，力图由此吸收西欧的新的思潮，从侧面参加到戏剧改革的运动之中去的^⑤。

1921年5月，沈雁冰、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熊佛西等十三个人在上海成立了“民众戏剧社”，开始真正地提倡话剧。这一行动在戏剧界具有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1921年1月）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本稿的意图不在于探索演剧运动的历史，这里只不过是想指明，中国话剧的兴起来源于日本的“新剧”，而且是在新剧的刺激之下导入了西欧的文化。